

第一 部分： 儒家民主

第一章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一項政治提議

場景：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在中國北京的北京大學。山姆·德謨 (Sam Demo)

現在已經常駐北京了，他走進王教授的辦公室，準備做一個預約好的採訪。王教授當時四十多歲，是一位在北大廣受尊敬的政治哲學家，他被選為代表參加二〇〇七年六月四日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制憲大會。（編者按：作者受到柏拉圖的影響，嘗試以對話方式表達思想中的矛盾。本章運用了虛擬手法，以美國人山姆·德謨為主人翁，虛構了他與北京大學政治學者王教授的一次對談。）

德謨：

（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吁吁地）感謝你今天的盛情接待。唉，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這個時段的交通是這麼繁忙。（停頓片刻）很抱歉我遲到了，我可是塞了兩個多小時的車啊。

王：

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為經濟發展付出的代價。我們經常從教科書上讀到所謂現代化往往會加快生活的節奏，可是與此恰恰相反的情況不也經常發生嗎？

德謨：

（大笑）可能更糟呢。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曼谷，普通開車上班的上班族不得不在自己的車內帶上一個便壺呢。但是經歷了經濟危機之後，交通情況倒是改善

了不少。(歎了口氣) 嗯，可是我現在仍然對我們在此討論中國民主政治改革前景，卻沒有秘密警察監視之虞覺得難以置信！回頭想想，如果是在十幾年前，誰曾想到有朝一日，為了通過一部適合中國的民主憲法，竟能召開全國大會呢？²

王：

回顧過去，我們就會發現原來變化並沒有你所想的那樣顯著。你應當記得，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風波之前，中國曾進行過一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且相當公開的辯論。人們看來已經忘記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就曾建立過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該機構有時會對一些主張政治變革的激進提議進行評估。而其後鄧小平的逝世看來提供了更多的變革契機。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出現了新的寬容跡象，同時知識分子又再次開始公開呼籲政治改革了。³ 而現在，政治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不可擋了。

德謨：

嗯，還有更怪異的事情發生呢。有誰能料到蘇聯帝國會一朝土崩瓦解，⁴ 而南非種族隔離又能平穩地得到廢止呢？(短暫停頓) 不過，我還是不大清楚你明天在制憲會議上的提案究竟是怎樣的。聽說你傾向於建立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這種體制意味着什麼呢？我深知中國改革者往往將民主視為一種增強國力的手段⁵——而與此相反，比如美國的理论家更傾向於從個人自由的價值方面

來論證民主體制的合理性。⁶——（可見）中國在論證民主體制的正當性時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我必須承認，對於中國這塊土地而言，一種獨特的與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模式有所不同的民主體制類型是更適合她的。換言之，無論是亞洲人或是西方人，看來都認同民主的政治理想，儘管他們擁護民主是出於不同的理由。

王：那我就試着闡釋一下我的方案吧。的確，我力主一種與西方不同的民主制度，這一制度是尤其適合中國國情的。明天我會力圖說服其他與會同仁，當然，我自信即使外國人也會慢慢欣賞我對這一方案的辯護理由的。

德謨：願聞其詳。

一、限制民主的民粹主義

為現代社會尋找有能力、有遠見的管理者

王：好的。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有共識吧：一個民主體制至少必須包括基於普選權之上的定期選舉，這一制度的目的在於給予那些縱使深處邊遠的普通公民在政治

決策中有發言權，同時還在於促使政治管理者直到任期末都能對選民負責。可是，這一制度恰恰也使得現代社會政治體制中的諸多有關議題與政策變得非常複雜，以至於大部分普通公民甚至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街上那位仁兄難道真正懂得提高利率⁷，或改革行政法規可能會帶來的影響嗎？現代社會中公共事務的極端複雜，決定了絕大部分的政治決策權力應當被置於一部分智力秀異、能力超群的精英階層手中，這幾乎已成為現代政治社會的一項功能上的需要。政府已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加需要精英的頭腦。

德謨：

的確如此。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也有許多現代社會在民主體制之下看來運轉良好。

王：

是的。可同樣是這些社會或許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有些事情最好還是留給更有資格的人去做得更好，從而給民主的多數設置了諸多的限制。作為研究生，我曾經用了六年的時間在美國讀書，不得不坦言，在這六年時間裏，我不斷地被美國「人民主權」的言辭與知識精英統治的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所震驚。當然，美國的一個反民主的制度設計，乃是由握有最終審查權而非選舉產生的大法官加以實

施的憲法權利法案，你想必也知道，美國最高法院有權否決當選政客的決策，據說這些政客的決策違反了美國憲法。

德謨：

嗯，不錯。或許你還可以用較鮮為人知的西方社會裏的中央銀行作為佐證，來支持你的論點。例如，在美國，聯邦儲備局（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有權制定貨幣政策，這種權力可能具有重要的經濟影響，如影響人們購買耐用消費品的決定等。⁸ 鑒於自己必須擁有權力制定在長時期內造福國家的重大經濟決策，這一秘密機構明確絕緣於民選政治家的干預。因此，舉例來說，美聯儲有時會通過增加利率來防止通貨膨脹，即使這意味着增加失業率也在所不惜。而一個更為敏感的央行可能無從違逆政治家的願望，在政治家看來，與失業作鬥爭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會顧及此舉會對長遠的經濟發展產生何種影響。這似乎存在一種明確的觀點，即對於成功的貨幣政策而言，相對於政治壓力的秘密性與絕緣性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多數的民選政治家既不具備制定有效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具備相應的政治意願。⁹

王：

不錯，這的確是個好例子。

德謨：

但你必須認識到人民仍然擁有最終權力。絕對多數擁有修正美國憲法的權力，¹⁰儘管修憲無疑是件費時費力的事情。而美聯儲的官員乃是由美國總統任命，並且必須得到參議院批准才可就職的。

王：

我懷疑這種「最終權力」在現實中發揮的效力究竟能有多大。¹¹而且，當我們觀察東亞的民主政治體制時，不難發現相對那些選舉產生的官員而言，知識精英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在日本，從精英教育體制中選拔出來的官員繼續掌控着權力與威望，以至於他們那些半虛構的（semi-fictionous）同僚會陷入一種「是，長官」（Yes, Minister）式的妒嫉之中。日本政治體制授予精英文官制定該國絕大多數政策的權力，而他們可以有效地做到不必對任何人負責，甚至包括民選政治家在內。¹²

德謨：

可是你願意支持這樣一種體制嗎？難道日本的政治體制不需要更大的開放性與問責性嗎？我想我沒有必要再提請你注意大藏省（The Ministry of Finance，今財務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危機中扮演的那種火上澆油（如果不是始作俑者的話）的角色了吧。¹³更不用提日本厚生省（The Ministry of Health，今厚生勞動省）

的那群官僚了，直到一九八五年被告知有H₁N₁感染危險之前，他們一直拒絕進口消毒血液。作為這幫官僚愚蠢固執的結果，數百名日本血友病患者死於愛滋病。¹⁴

王：

知識精英的確會犯下悲劇性的錯誤，但是選舉產生的政客也難免於此啊。因此我更為憂慮的還是這種政治體制，在該體制下，自我感覺良好的政客通過開出無數的空頭支票來換取選票，從而掌握政權。他們口口聲聲說什麼「我們將裁減稅收並增加公共投資」，什麼「讓經濟全速發展」，許諾滿天飛，卻從不慮及長遠的後果，讓後代去擔心天文數字的赤字和生態災難！

德謨：

說得好。不過我擔心你可能低估了某些選舉產生的政客的智商了吧，並非所有政客都會讓長遠利益屈尊於短期收益之下。舉例來說，朗奴·列根（Ronald Reagan）似乎太過聰明了，以至於根本沒有抓住自己一度倡議之政綱的長期徵兆。

王（微笑着）：福禍相倚吧（for better or for worse）。他的確是在玩火，然而他也確實發起了一場拖垮了蘇聯經濟的軍備競賽。不管怎樣，在我看來，理想的政治體制應當讓那些聰明睿智、目光長遠之士進行統治的同時，使得他們對自己的作為負起責任。日本政治體制的弊端即在於，那些「官員們」——該國掌權的高層決策者——在黑箱中秘密決策。因此當事態惡化時無法追究其責任。